

诗 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诗 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陈中梅 译注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年·北京

ΑΡΙΣΤΟΤΕΛΟΥΣ

ΠΕΡΙ ΠΟΗΤΙΚΗΣ

SHĪ XUÉ

诗 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陈中梅 译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30-0/B·229

1996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19 千

印数 7 000 册

印张 10 3/8

定价: 14.00 元

目 录

引言	1
说明	22
内容提要	24
第 1 章	27
第 2 章	38
第 3 章	42
第 4 章	47
第 5 章	58
第 6 章	63
第 7 章	74
第 8 章	78
第 9 章	81
第 10 章	88
第 11 章	89
第 12 章	93
第 13 章	97
第 14 章	105
第 15 章	112
第 16 章	118

第 17 章	125
第 18 章	131
第 19 章	140
第 20 章	143
第 21 章	149
第 22 章	156
第 23 章	163
第 24 章	168
第 25 章	177
第 26 章	190

附 录

(一) Muthos	197
(二) Logos	200
(三) Phobos kai eleos	203
(四) Mimēsis	206
(五) Hamartia	218
(六) Katharsis	226
(七) Tekhnē	234
(八) 史诗	246
(九) 悲剧	248
(十) 喜剧	250
(十一) 狄苏朗勃斯	252
(十二) 历史	254
(十三) 柏拉图的诗学思想	258

(十四) 诗人·诗·诗论	275
正文索引	295
人名索引	295
作品索引	297
引言注释和附录索引	299
部分人名及神名索引	299
内容索引	305
希腊词语索引	308
部分参考书目	315
后记	321

引 言

亚里士多德生平简介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ḥ)的祖先住在安德罗斯(Andros),以后移居斯塔吉拉(Stagira)。¹ 他的父亲名叫尼各马可斯(Nikomakhos),是一位名医,在马其顿(Makedonia)王国的宫廷里任职,和国王阿慕塔斯(Amuntas)二世颇有私交。尼各马可斯是个有学问的人,曾撰写过医学论著。亚里士多德自幼跟着父亲出入宫廷,结识了王子菲利普(Philippos)。亚氏的母亲名叫法伊丝提丝(Phaistis),娘家是来自卡尔基斯(Xalkis)的移民。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在斯塔吉拉,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了继续求学,十七岁的亚里士多德在“保护人”普罗克塞诺斯(Proxenos)的带领下,于公元前367年去了雅典,就读于柏拉图(Platōn)的学园(hē Akadēmeia)。亚氏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好学,² 据说被誉为“读书人”(anagnōstēs)和学校的“头脑”(nous tēs diatribēs)。在学园里,他一呆就是二十年,先当学生,继而独立进行了一些课题研究。尽管在学术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但对老师,亚里士多德始终是非常尊敬的。柏拉图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对于他,“卑劣的人甚至连赞扬的资格都没有”。³

柏拉图于公元前348—347年间去世后,其位置由外甥西培乌西珀斯(Speusippos)接替,亚里士多德遂和柏拉图的另一位高足

塞诺克拉忒斯(Xenokratēs)一起离开了雅典。⁴ 在慕西亚(Musia),亚氏受到了赫耳梅阿斯(Hermeias)的热情接待,并和已在那里的“校友”厄拉斯托斯(Erastos)和科里斯科斯(Koriskos)等聚首。不久后,瑟俄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os)亦抵达该地,被亚氏收为门生。三年后,亚氏离开阿索斯(Assos),在莱斯波斯(Lesbos)做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和研究,侧重点可能在生物学方面。公元前343—342年间,亚氏应菲利浦之邀,前往培拉(Pella)当了年方十三岁的王子亚历山大(Alexandros)的教师。⁵ 亚氏所授的课程包括诗(荷马史诗和悲剧等)、政治、伦理学和修辞学等。⁶ 公元前340年,亚历山大受命主持政务,亚氏可能于不久后返回老家斯塔吉拉。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重返雅典,在城的东南郊租了几幢房子,办起了一所学校,取名鲁开昂(to Lukeion)。⁷ 在校园的建筑物中,有一处带遮盖的庭院或走廊(peripatos),⁸ 据说亚氏讲学时喜欢在里面来回踱步(peripatein)——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逍遥学派”(或“庭廊学派”)以后成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同义语。办学期间,亚氏不遗余力地多方搜集手稿、地图和标本等资料,可能还筹建了一座供教学用的博物馆。⁹ 学校开设了多种课程。在亚里士多德的精心指导下,高材生们既有较为宽广的知识面,又各有自己的专长。比如,瑟俄弗拉斯托斯钻研过植物学,欧代摩斯(Eudēmos)擅长各种“史”的研究,阿里斯托克塞诺斯(Aristoxenos)在研究音乐方面展现了才华。师生有每月一次的研讨会,还有定期的聚餐会。经过亚氏的长期努力,鲁开昂里群星闪烁,精英荟萃,学校的名声逐渐盖过了当时在塞诺克拉忒斯主持下的学

园。

亚里士多德在鲁开昂讲学和从事著述凡十三年。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 年去世后，希腊各地反马其顿的情势日趋表面化。以他的家族背景以及和亚历山大的私交，亚氏在当时自然难免受到某些雅典人的怀疑和猜忌；事实上，有人已在为他罗织罪名。¹⁰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亚里士多德——“为了不让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¹¹——决定离开雅典，去他母亲的老家，即欧波亚岛 (Euboia) 的卡尔基斯。一年后，即公元前 322 年，亚里士多德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在慕西亚居留期间，亚里士多德娶了赫耳梅阿斯的外甥女（一说养女）普茜阿丝 (Puthias)，生一女，亦名普茜阿丝。妻子普茜阿丝死后，亚氏续娶了斯塔吉拉女子赫耳普莉丝 (Herpullis)，生一子，名尼各马可斯。

思想家·学问家·著述家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他以知识的广博著称，以擅能“驾驭”学问闻名。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从他的学术中领取教益，在他的启发下从事文理科方面的研析。亚里士多德是知识的不倦的探求者，是大规模、跨学科的研究工程的设计者，是哲学史上有数的几位集大成者的杰出代表。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或科学分作三类，即理论或思辨科学 (theoria)、实践科学 (praxis) 和制作科学 (poiësis)。制作科学的任务是制造，其目的体现在制作活动以外的产品上。诗属于制作科学或技艺的范畴。实践科学 (如政治和伦理学) 包含行动的目的，其意

义体现在行动或活动(energeia)本身。实践科学是自足的科学,尽管它们不直接指导具体的生产和制作活动。亚里士多德哲学认为,凡是自足的事物便自然地高于不自足或有欠缺的事物——因此,实践科学高于制作科学。但是,实践科学一般不包括自己的工作对象,比如,政治不包括作为其工作对象的城邦和公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科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自足的科学。真正自足的科学是理论科学(物理学、数学、形而上学等)因为它们不仅包括行动的目的,而且还包括自己的工作对象,即思辨的内容。理论科学在神¹²的活动中找到自己的“归宿”。神的活动是理论科学之“自我实施”的最佳典范——神的活动是作为最高活动形式的“思想”,其思辨内容是作为最高思辨对象的神本身。神是“思想的思想”(noēsis noēseōs)。高精度、高纯度的思辨是最彻底的“善”(aretē)。

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极丰,¹³研究面极广,在当时的人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学科领域内几乎都有重大的建树。亚氏的论述分两类,一类面向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因而是“公开的”或对外的;另一类则专供小范围内使用,其听众和读者主要是亚氏的学生,因而是“不公开的”或对内的。前一类论著(即 ekdedomenoi logoi)一般用对话体写成(但不像柏拉图“对话”那样具戏剧性),结构严谨,文句经过推敲润色,具较高的文学价值,颇受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推崇。¹⁴第二类论著(即 akroatikoi logoi)一般用论述文形式写成,内容相对艰深,用词比较简炼,文句较少润色,某些篇章的结构亦比较松散。《诗学》可能是一篇对内的或者说未经正式发表的著作。

有趣的是,除了《雅典宪政》(*Athēnaiōn Politeia*)外,亚氏的对

外的著作已全数佚失,而他的 akroatikoi logoi 中的相当一部分却被保存了下来。公元前 387 年,亚里士多德在离开雅典前曾把文稿托付给瑟俄弗拉斯托斯。瑟氏把文稿转托给学生奈琉斯(Néleus),后者把它们带到斯开浦西斯(Skēpsis),以后又转手他人。为了躲过帕耳伽蒙(Pergamon)的搜书官的耳目,书稿的保存者把它们塞进了地窖里。多年后,藏稿人的后代以高价将这批文稿卖给了忒俄斯(Teos)学者阿裴利孔(Apellikōn)。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攻陷雅典后,将文稿运回罗马,经语法学家图拉尼昂(Turanniōn)校订,最后由罗得斯(Rhodos)的安德罗尼科斯(Andronikos)在公元前 40 年左右整理出版。¹⁵

诗 论

古希腊人以专文论诗(包括音律、修辞等)或评诗并非始于亚里士多德。亚氏从前辈手里接过的诗评“遗产”是丰厚的,包括高尔吉亚(Gorgias)的《海伦颂》(*Helenēs enkōmion*),厄利斯(Elis)的希庇阿斯(Hippias)的《诗论》,德谟克里特(Demokritos)的《论诗》,雷吉昂(Rhēgion)的格劳科斯(Glaukos)的《古代诗人》和柏拉图的《伊昂篇》以及其它“对话”中的有关卷章等。一些学者对荷马史诗颇有研究:德谟克里特探究过其中的词义问题;和当时的专家们一样,萨索斯(Thasos)的斯忒西勃罗托斯(Stēsibrotos)可以揭示作品中“藏而不露”的意思(tas huponoias)。¹⁶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起,艺术家中也有人开始著书立说;阿伽萨耳科斯(Agatharkhos)、欧弗拉诺耳(Euphranōr)、阿培勒斯(Apellēs)和普罗托革奈斯(Prōtogenēs)等写过专著或论文。在柏拉图的学园里,亚氏的同窗

西培乌西波斯研究过修辞和艺术理论,塞诺克拉忒斯写过一些有关讲演术和文学评论的著述。¹⁷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对悲剧的研究也早已超过了“填补空白”的水平。亚里士多德没有生活在真空中。当我们为他的成就瞠目时,不应忘记他的前人和同时代的学习者们的贡献,尤其不应低估他的老师柏拉图对他的影响。《诗学》提出的某些观点显然是柏拉图所熟悉的,例如艺术活动的特点是摹仿(mimēsis),优秀的作品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等等。

据有关文献记载,亚里士多德用对话体写过一部《诗人篇》(*Peri Poiētōn*,共三卷)和一部《格鲁洛斯篇》¹⁸(*Grulos*)或《修辞篇》(*Peri Rhetorikēs*)。在他的对内的论著中,专门论诗(包括音乐)和艺术的著作包括《技艺集锦》(*Tekhnōn Sunagōgē*,共两卷)、《论音乐》(*Peri Mousikēs*)、《诗论》(*Poiētika*,共一卷)、《论悲剧》(*Peri Tragōidion*)和《荷马问题》(*Aporēmata Homērika*)等。此外,亚氏还编纂过一部 *Didaskaliai*,专门记载历届狄俄尼索斯庆祭活动(ta Dionusia)中上演的剧目以及得胜诗人的名字。上述著作均已失传。¹⁹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ēs Laertios,生活在公元二至三世纪)所收列的书目中还有一部《诗艺指导》(*Pragmateia Tekhnēs Poiētikēs*,共两卷),一般认为,这篇著作即为《诗学》(即 *Peri Poiētikēs*)。

诗评当然也包括对诗和诗人的批评。古希腊人对诗和诗人的评论始于公元前六世纪。塞诺法奈斯(Xenophanēs)指责荷马(Homēros)和黑西俄得(Hesiodos)不恰当地把神人格化,并让他们做出偷窃、欺骗和通奸等不光彩的事情。²⁰赫拉克利特(Hērakleitos)主张禁止诵读荷马和阿耳基洛科斯(Arkhilokhos)

的作品。²¹柏拉图继续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哲学与诗的抗争”。²²他对诗和诗人的抨击次数之多,论据之充分,驳斥之有力,都是前人无法与之比拟的。在严词鞭挞之余,柏拉图对学人们发出了如下挑战:如有哪位懂诗的学者能够证明诗不仅可以给人快感,而且还有助于建立一个合格的政府和有利于公民的身心健康,我将洗耳恭听他的高论。²³《诗学》可能是对这一挑战的应答,尽管我们无需对此作出狭义上的或排它性的理解。《诗学》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不是一篇答文,也不在于它的应答是否成功,而在于它的宽广的涉及面,它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可贵的实用价值。

《诗学》

《诗学》立论精辟,内容深刻,虽然篇幅不长,但气度不小,无疑是一篇有分量、有深度的大家之作。《诗学》探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如人的天性与艺术摹仿的关系,构成悲剧艺术的成分,悲剧的功用,情节的组合,悲剧和史诗的异同,等等。《诗学》提出的某些观点——如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的观点和诗评不应套用评论政治的标准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可贵的创新意义。这篇不朽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一种新的、比较成熟的诗学思想的精华。作为西方现存最早的一篇高质量的、较为完整的论诗和关于如何写诗及进行诗评的专著,《诗学》的学术价值以及它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学评论史上的地位,是怎么估计都不会太高的。

当然,如果以“苛刻”的标准来衡量,《诗学》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诗学》强调了诗的“自我完善”,却没有提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发展的宗教背景,也忽略了悲剧的存在、兴

盛和趋于衰落的社会原因。悲剧人物固然应对自己的抉择(或决定)和行动负责,但在某些作品里,命运(moira)的制约或神的催动是导致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原因。《诗学》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诗学》肯定了艺术在开发人的心智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使人“认出了某某人”²⁴——作者放弃了一个极好的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艺术摹仿有益于深化人对自我以及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机会。

《诗学》不是一篇完整的、经过作者认真整理润色的、面向公众的著作。成文以后,又历经波折,包括被搁置地穴多年,原稿中平添了一些侵蚀和模糊不清之处。此外,历代(尤其是早期的)传抄者和校订者的增删和改动,有的或许符合作者的原意,有的则可能纯属杜撰,故此反而加大了理解的难度。从“技术”的角度来衡量,《诗学》也不是白璧无瑕的。《诗学》中的术语有的模棱两可,个别概念缺少必要的界定。文字的布局有些凌乱,某些部分的衔接显得比较突兀。

关于《诗学》的成文年代,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该书成于公元前 347 年前,即作者离开柏拉图的学园之前;另一种认为该书成于公元前 335 年以后,即亚氏回到雅典后,在鲁开昂办学期间。²⁵两种观点各有依据,但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接受第二种观点。《诗学》也可能不是一次写成的,也就是说,作者可能对它作过增补或局部的修改。

《诗学》究竟是不是两卷本(或是否还有一个已经遗失了的部分),一般的看法是肯定的。²⁶在第欧根尼·拉尔修列出的书目中, *Pragmateia Tekhnēs poiētikēs* 有 a、b 两卷。从《诗学》本身的布局

来看,似乎也应包括一个讨论喜剧的部分。事实上,作者在第6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喜剧是他将要讨论的一个项目。亚氏在《政治学》8.7.1341^b39里表明,他将在 *en tois peri poiëtikês* (“论诗的著作里”)解释 *katharsis*。《诗学》的现存部分中找不到这一解释,因此,有理由相信,有关论述或许包容在已经佚失了的那一部分里。²⁷阿蒙尼俄斯(Ammônios 活动年代约在五世纪)曾评论过亚氏的《论阐释》(*De Interpretatione*),在提及《诗学》时用了复数。²⁸波厄修斯(Boethius 约480—524年)也钻研过《论阐释》,并于507年发表了六卷本的译文和注释。在第2卷里,他似乎间接地指出了《诗学》是一部两卷本的论著。²⁹欧斯特拉提俄斯(Eustratios 大约生活在十一世纪)在论及《尼各马可斯伦理学》1141^b14时,提到了《诗学》1448^b30中的内容,并说他所引的话出现在 *peri poiëtikês* 的“第一卷里”。在1278年出版的一部著作里,莫耳贝克的威廉(或Guillaume de Moerbeke)似乎也暗示《诗学》还有第2卷。³⁰十六世纪时,意大利学者维克托里乌斯(Victorius)对《诗学》(*arte poetarum*)第一卷进行了评论。³¹

抄本、校译本及《诗学》的流传和影响

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诗学》产生了许多抄本。³²现存最好的抄本是Parisinus 1741,校订者们往往把它简称作A或A^c。该抄本成于十一世纪,是公认的较为可靠的范本。这部抄本1427年时还在君士坦丁堡,于十五世纪末经人转至佛罗伦萨,最后被送往巴黎,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十六世纪时,维克托里乌斯在佛罗伦萨对抄本作过校订。在此以后的几个世

纪里,不少学者为校订 Parisinus 1741 花过心血。在该抄本的基础上,蒂里特(Thomas Tyrwhitt)于 1794 年,贝克(Immanuel Bekker)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先后发表了校订本。德国学者瓦伦(Johannes Vahlen)于 1867、1874 和 1885 年三次发表了校订本和评论,基本上确立了 A 或 A^o 的权威地位。根据原始抄本及瓦伦校订本等文献,英国学者布切尔(S. H. Butcher)和拜瓦特(Ingram Bywater)分别于 1894 年和 1909 年发表了校订本、译文和具有空前水平的评注。

另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抄本是 Riccardianus 46,校订者们称之为 B 或 R。该抄本的成文年代在十三至十四世纪,³³但迟至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存佛罗伦萨。研究表明,Riccardianus 46 可能代表了一个不同于 A 或 A^o 的抄本系统,所以,任何一位负责的校订者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该抄本中的某些语句填补了 Parisinus 1741 中的不足。例如,Riccardianus 46 在 1455^a14 行的 to men gar toxon 和下行的 toxon 之间有十四个词,而这些词却没有出现在 Parisinus 1741 系统的抄本里。这一遗漏似应归咎于当年的某个粗心的传抄者——他在抄完第一个 toxon 后,眼神溜到了第二个 toxon 以后的内容。

大约在九世纪末,Ishāq ibn Hunain 将《诗学》由古希腊文译成叙利亚文,他所依据的是七世纪以前的某个古抄本。除了第 6 章的部分内容外,该译本早已不复存在。大约在十世纪,阿拉伯学者 Abū Bishr Mattā 又把《诗学》从叙利亚文译成阿拉伯文,尽管他连悲剧是什么都不知道。³⁴十二世纪下半叶,哲学家阿威洛伊(Averroes 1126—1198 年)根据某个阿拉伯文本对《诗学》作过评

论。³⁵阿拉伯译文的粗砺和不精确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叙利亚文本译自一个比 Parisinus 1741 早得多的古希腊文抄本,因此,尽管阿拉伯文本译自本身已是译文的叙利亚文本,对校订者来说,该译本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³⁶英国学者马戈琉斯(D. S. Margoliouth)的《诗学》英译本较为倚重于阿拉伯文本提供的信息。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在校订《诗学》时一般都采用了兼取各家之长,认真比较、审定的方法,尽管他们主要依据的还是 Parisinus 1741 及其系统的抄本和校订本。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5 年推出的卡塞尔(Rvdolfvs Kassel)校订本,是目前最权威的《诗学》原本——它的出现使其它校订本不得不退居次要的地位。³⁷

尽管苏拉于公元前 86 年将亚里士多德的书稿运至罗马,但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批著作的流通量并不很大。西塞罗读过亚氏的“对话”,但不熟悉亚氏的对内的著作。当时的哲学家大概主要是通过亚氏的“对话”接触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哲学在罗马还是有影响的。罗马皇帝尼录(Nero Claudius Caesar)当过亚里士多德学派成员的学生,马科斯·奥瑞利乌斯(Marcus Aurelius)也曾听过该学派成员的讲座。在二世纪,学校已开设亚里士多德逻辑学。

在罗马,学者文人中可能不乏对亚氏哲学有所了解的人,但是,人们绝少提及《诗学》,好像这篇著作根本不存在似的。没有人对《诗学》作过专门的研究。哈利卡耳那索斯(Halikarnassos)的狄俄努西俄斯(Dionusios)和修辞学家昆提利阿努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对亚氏的诗学理论所知甚少,仅提过词类的划分;大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似乎没有读过《诗学》。在拜